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李鸿章全传 (下)

主编

刘华明

郑长兴

印刷工业出版社

第八章 洋务顿挫

一、被迫应战

朝鲜一直处于新旧两派激烈斗争中。新派中有的人追随清朝办理洋务,有的人则追随日本进行西化。而旧派人则力图保持东方文化。在中国同治初年,朝鲜有一个叫崔济愚的人,采取儒佛道三派教义创立“东学道”,宗旨是抵制西学的传播。同治三年,他被以愚民惑众的罪名捕杀。其后,又有崔时亨继起传道,信徒更多,而且渐渐增加了政治色彩。东学道之所以能迅速传播,是因为它的鲜明的民族意识,既反对政府的腐败,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

李鸿章注意朝鲜问题是从抵制日本侵略的目的出发的。他平定了两次朝鲜变乱,派了驻朝商务监督,都是为了对付日本,所作的改革集中于军事,而对于民政没有插手。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的朝鲜与中国一样也是内政腐败,经济衰退,上层统治者的奢侈与下层人民的贫穷形成鲜明对照。民间有许多充满怨恨的歌谣,形容当时的情况。例如: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落泪,歌声高处怨声高”。

李鸿章对朝鲜内政不修的危险也表示过忧虑。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893年12月19日),他将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的电报转述给总署:

袁道电，昨闻韩廷拟托美商购买兵船，并托德商购现物，而各营兵饷未发已四阅月，民心极怨，当即向近臣剴切劝说，据答船物罢议，兵饷即放。再，韩宫日夜宴乐，招优伶百人，而民哭兵饥不知恤，殊可虑，拟仍随时切劝云。

在这种情况下，东学道的活动很有群众基础。还在三月下旬，朝鲜忠清道报恩县就有东学道人2万余众以讨倭为号召，聚会闹事。袁世凯力促朝鲜政府派兵前去镇压。朝廷派了赵秉镐和鱼允中率军去平定。

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二月下旬，东学道又有1万余人在全罗道古阜等县重新起事，推举全琫准为总督，传檄四方，以逐灭洋倭，抨击敝政为目标。义军声势日益壮大，很快从全罗道发展到京畿、江原、黄海、庆尚等道。政府军束手无策，甚至不敢应战。

朝鲜政府只好向袁世凯请求清廷派兵代剿。袁世凯认为朝鲜无力平定内乱，请求中国代为勘乱，自然是上国体面，中国应该接受。当朝鲜政府求助公文到达时，立即告知日本。这是根据中日光绪十一年(1885年)条约规定办理的。该条约只有中日派兵彼此知照的规定，而没有中国派兵日本也派兵的规定，顶多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兵百余名来汉城而已。无关大局。

当时，日本公使馆译员郑永邦受命查问“匪情”，向袁世凯说，“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希望中国速代韩勘乱。袁世凯回答说，韩廷也有这个要求，但我政府希望韩国能习战自强。接着，以探询口气问，按条约，我如出兵，应由何处知照日本？郑答：“由总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无他意”。袁世凯信以为真，电告李鸿章。

李鸿章相信了袁世凯的判断，拟派叶志超率精兵千人，以及海军4只军舰一起去朝鲜救援。

四月三十日(6月3日)，朝鲜国王乞兵书送到袁世凯处。上

写：

案照敝邦全罗道所属之泰仁、古阜等县，民习凶悍，性情险恶，素称难治。近月来附串东学教匪，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前经遣军前往剿抚，该匪竟敢拼死拒战，致练军败挫，失去炮械多件。似此老顽久扰，殊为可虑。倘滋蔓日久，其所以贻忧于中朝者尤多。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兹拟援案请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敝邦各兵将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

这一天，日本驻韩使馆署理公使杉村浚打听袁世凯，朝鲜请没请援，中国是否答应。他并且表示，日本希望中国迅速出兵代韩“剿匪”。袁世凯对他说，韩国如果请援，中国可以允许。事后，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同一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也向李鸿章询问朝鲜乞兵的事情。李鸿章也如袁世凯一样回答说，如果韩国请兵，中国势必准许。

在中国谋求加强宗主权的时候，这似乎是既定方针。但实际上却坚定了日本的判断。日本早在四月二十七日（5月31日）就已经得到中国的情报，知道中国完全没有准备。日本可以引诱中国走上战争的泥潭。所以现在外交人员的试探完全是有所计划的。袁世凯首先被日本怂恿，上了圈套；接着，他又帮着日本把李鸿章也引上了圈套。

二十九日（6月2日），日本内阁就作出了决议，出兵朝鲜，派一个陆军混成旅，海军以8艘军舰组成联合舰队。连夜讨论怎样作战和如何取胜等问题。三天后，成立了有参谋总长、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高级官员组成的战时大本营。陆奥宗光向回国述职的驻韩公使大鸟圭介面授挑起战端的任务。大鸟接受任务后，当天就带400名海军陆战队乘“八重山”号巡洋舰回韩。

李鸿章完全不知道日本的企图，以为还如同前两次朝鲜内乱一样，中国一出兵即可解决问题。五月初一日（6月4日），李鸿章派丁汝昌率济远舰、扬威舰赴朝鲜仁川，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带淮军 1500 名，分乘招商局轮船去朝鲜。同时，遵照《中日天津条约》，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于五月初三日（6月6日）将此事通知日本。

日本蓄意发动战争。还没有接到中国通知就派遣了 7000 人的大军到朝鲜汉城。接着日本外务省照会中国，否认朝鲜是中国的属邦，对汪凤藻照会内称朝鲜为“属邦”加以指责。

李鸿章复电汪凤藻说，朝鲜为我属邦，“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态度十分坚定。日本驻华署使小村寿太郎照会中国总署，驻天津日领荒川也告知李鸿章，日本出兵是为了保护日侨和日本在朝使馆。李鸿章对他说，中国派兵专剿内地土匪，不到汉城和通商口岸，汝国不必添兵；如已派兵，断不可多，而且不是韩国所请，断不可入内地，“致华日兵相遇生衅”。

袁世凯看到日本不按约办事，增兵朝鲜，来者不善。一面嘱朝鲜外部向日本劝阻；一面给李鸿章发电，“日近年因韩人轻侮顽疲，迭有应照约驻兵挟制之议，今果乘机行，似非口舌所能阻，既来又恐非暂时所能去。闻日来告韩署，谓我既有约（指日韩济物浦条约），即无事时我亦可遣兵，是行我应有权利，并请韩速照约修备兵房等语。”袁世凯是对的，他看出日本这次的来势凶猛，仅口舌之争是阻止不了的。

但李鸿章立意不与日本打仗，所以在军事上不作积极部署，尽在外交上作文章，并依赖各国主持公道。

五月初七日（6月10日）电告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独调兵，各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

甚至错误地以为日本派兵来朝,只是为了与中国争体面,不是来寻战的。让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切勿惊扰”“华兵去,日自息。”

初九日(12日),中日两国在朝鲜的最高官员袁世凯和大鸟圭介约定各自向本国电阻加兵。李鸿章真的决定停止添兵。而日本根本没有诚意,军队越来越多。原来大鸟与袁世凯约定电阻加兵是一种骗术,旨在片面的延缓中国的军事布署。

中国已经派到朝鲜的军队驻扎于牙山一带。朝鲜官军看到宗主国出兵保护,士气大增,居然打了胜仗。东学道徒四散溃逃,也有接受政府招抚的。

东学道起义已不足为患。但日本仍不停止派兵。对此,朝鲜政府十分不安。五月初十日(6月13日),韩王致书袁世凯,希望中国首先撤兵,内称:

“前因南道土匪猖獗,恳请天兵前来代剿,乃该匪闻知此情,已即胆落,……大军一到,巨寇即除,不战而克,神武昭著,刻知不敢再劳天兵前进;且该匪散处伏丛深,惟敝邦率向易围捕获,似非上国士卒,堪执此责。更有危机尤须通情,日本以天兵来剿,疑忌多端,日前突发五六百兵驻我都下,屡由外署驳论阻止,终不听从,竟似必须天兵撤回,始肯同撤。传闻仍有数千名继来于后。……即恳贵总理迅即电稟中堂,酌量援救,非敝邦所敢渎请也。”

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电报后,即电告叶志超等停止进兵,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圭介约定同时撤兵。将此于十一日(14日)电告总署。

这一天,李鸿章另给袁世凯一电,问袁:大鸟究竟说日兵何时撤?是否必撤?“须取伊信函或回文为据”,如此才能派船去接回我军。给总署的电报中说,叶、聂所部仍驻扎于牙山,要等袁与大鸟商妥办法再撤,并且也警惕到日本可能有取中国而代之的意图。所以又强调“倘日尚留兵,彼留若干,我亦应留若干,与之相持,此

时防日较重于防匪。”

在朝鲜乱事已平的情况下，中国要求依约撤兵，日本没有理由拒绝撤兵，但实在是不愿撤兵。怎么办呢？它提出一项中国不可能同意的要求，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它知道，中国作为宗主国，尚且不干涉朝鲜内政，日本不是宗主国，更无理由干涉朝鲜事务，因此中国难于同意。这一来，它就可以与中国纠缠下去了。这一着确实狡诈。

五月十二日（6月15日），日本政府通过《朝鲜内政改革案》。外相陆奥宗光训令大鸟圭介不撤兵，说：“目前乱事已定，和平亦告恢复，但今后中日两国间犹有不可避免的争议发生。内阁会议已决议采取断然措置，拟与清国协力改革朝鲜政府，并强迫清政府任命共同委员。此议将于明日内本大臣向驻清使提出，推尚须守秘。……当与清国谈判期间，阁下无论用何种借口，务必留我兵于京城（汉城）内，盖李鸿章亦苦心筹划撤退日兵之法。”

十三日（16日），陆奥约见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谈改革韩政问题。十四日（17日），日本驻华公使小村正式照会总署，驻天津的领事也正式照会李鸿章。

李鸿章看到日本要求的三条，一是要与清军会剿东学道人，二是要与中国共同派员整理韩政和税务；三是要与中国共同派员教练韩军。李鸿章当即电告驻日使臣汪凤藻，入韩乱已平，我军尚且不再进剿，日军更无会剿的理由；日本没有干预韩国内政之权，应直接回日本。同日，李鸿章把这些布置电告总署，末了，气愤地评论日本政府道：“日庭”“狡肆”，韩政虽然“暗弱”，岂日本“所能更改”！“可恨”！

驻日公使汪凤藻来电，分析日本“志在留兵协议善后，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李鸿章害怕把日本的战争欲望挑起来，回电说：“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

因疑必战，殊非伐谋上计。”

不过，袁世凯于十五日（18日）连续来了三封电报，也主张增兵。但他说的是：今年是太后六十大寿，日本知道我必然忍让，如果见我大举增兵，反而好收场。不如先调南北洋海军，来韩加强战备，并接着调来陆军。李鸿章一想也有理。遂决定作出战备姿态。电令丁汝昌率北洋数船到朝鲜仁川壮声势；电令叶志超移营于距仁川和汉城都较近的马山浦，但要避免与日兵靠近，以免相逼生事；另调卫汝贵率3000精锐支援。李鸿章相信这一来就可以避免战争了。

五月二十日（6月23日），日本照复中国，强调日本“断不能撤退现驻朝鲜之兵”。这就是说日本并不怕与中国军队接触，而是希望与中国军队磨擦甚至打仗；不是为了与中国和解，而是为了促成破裂。对此，外相陆奥宗光后来的一段话作了很好的证明。他说：“以此次事件论之，毕竟朝鲜内政之改革云者，不过为调停中日两国间之难局所筹划出之一政策。……余假此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两国关系，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

从日本的无理纠缠中，李鸿章开始感到战争的危险。当他想到中国实力不足以与之较量时，主张还是要尽量避免开战。

五月二十日（6月23日），他电告总署说，日本派到朝鲜汉城的兵力已达2000人，驻仁川的也有4000人。汪凤藻和袁世凯都请求添兵。但我鸿章认为日兵分驻于汉城和仁川，已经占了先着。如果我多派兵与之逼近，容易生事，如果驻扎较远，则多派与少派是一样的。现在叶志超驻兵于牙山，距汉城220余里，陆续添兵已达到2500百人，足可以自我保护了。我如果再多调兵，日本也必定再添调，事情将何以收场？现在备而不发，且看局势发展再定。丁提督添派铁甲舰“镇远”号和广丙、超勇两艘快舰到仁川，官兵

600人,均不便上岸。归根到底,李鸿章虽然也派了兵,但不愿与日兵对峙。

李鸿章还是相信外交方法解决问题。

曾任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来到天津。李鸿章抓住机会请他电请英国政府劝阻日本,不要进兵。欧格纳一口答应照办,但怕日本不听。不久,英国领事来告诉李鸿章,已经电请英国外部派驻英国的日本公使转致日政府了。

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来天津时,李鸿章也与他面谈。此次日本派兵大多,似有别意,俄国与朝鲜是近邻,岂能漠视,请他速叫俄国外部,转电驻日俄使,劝告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兵,以免后患。喀希尼深表同意,说日内就发电文。第二天,李鸿章回访喀使,指出日本派重兵干预朝鲜内政,实“为侵夺谋”。喀使说:“俄韩近邻,亦断不容日妄行干预”。李鸿章很满意他的承诺。

李鸿章一贯使用“以夷制夷”策略。这一次,他还是以为日本素来怕英国,更怕俄国。如得英俄两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两面夹攻,估计“或易就范。”

解决国际争端使用外交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应该以一定的实力为后盾。李鸿章这期间却没有进行积极的战争准备,贻误了时间。对此,翁同和很是不满,在二十二日(25日)日记中写道:“朝旨屡饬李相添兵,仅以三千勇屯仁川、牙山一带,迟回不进,嘻!败矣。”

五月二十二日(6月25日),俄使喀希尼派参赞来通知李鸿章,俄皇已经电谕驻日俄使转致日本政府,劝其与中国同时撤兵,然后商议善后办法,如果日本不听,可以用压服办法。李鸿章心里更踏实了,他认为俄国真的会在日本不听劝告时,以武力来压服日本,真是够朋友。

同时,李鸿章示意袁世凯在朝鲜也进行外交战。袁世凯照会

各国驻朝使节出面调处。汉城外交团于五月二十二日(25日)联名函请袁世凯、大鸟圭介协商中日同时撤兵的事情。中国当然同意,而日本根本无意和平,婉言拒绝。

日本不但拒不撤兵,而且增兵。二十五日(28日)晚,袁世凯发急电报告日本续来之兵又有3000人登岸,并逼迫朝鲜在一天内答复是否为中国属邦,如果答复是属邦,日韩就失和,并声言日本已准备好了2万兵力。以此相威胁。李鸿章回电指示:“逼韩不认华属,断不可从。俄在日议正紧,忍耐必有区处。”二十六日(6月29日),李鸿章召集幕僚开了一天的会,讨论朝鲜问题。指示袁世凯敦促韩王要坚持下去不要怕日本而不敢承认是华属,否则中国将兴师问罪。这一天李鸿章一反往日的雍容大度,对于日本以兵力威胁朝鲜的行为十分气愤。

这时,驻英公使龚照瑗电告日本正在英国订造大铁舰,俄国也好象暂时不想插手。李鸿章开始悟到喀希尼日前所说的“压服”,可能也是空话。

二十七日(30日),喀希尼通知李鸿章,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对驻俄日使明确表示不肯撤兵,但如无别项缘故,日人不先开仗。其实,所谓“别项缘故”是随时可以找到的。

张荫桓从总署来电问道,枢廷对俄使的“压服”说很感兴趣,曾经向赫德宣扬过,近日电闻,事机不妙。是喀希尼太夸海口,还是俄国议而不决,请电示。

二十八日(7月1日)。李鸿章回电:喀希尼倒是实心,可能是驻日俄国使臣被日本所迷惑,不甚用力。

光绪帝对李鸿章一味寻求外交解决十分不满。诏令他实力筹备战守。他奏上了《酌度倭韩情势议筹办理折》,内称北洋现在只有8艘军舰可以投入战斗,请求户部筹出二三百两白银作为军饷,以便随时拨用。

朝廷一见这封奏折，就急了，怎么练兵多年，只有八艘军舰可以参加战斗？二十九日（7月2日），上谕申斥他，并责令他报告海军究竟所练之兵有多少？北洋分驻沿海的防军有多少？直隶省的绿营兵丁有多少可以参加战斗？

六月初二日（7月4日），李鸿章详细作了报告，并进行解释。他说道：

北洋海军现有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济远、来远、致远、靖远、经远等快速舰5艘，这些都是购自外洋的；另有平远号快速舰一艘是产自福州造船厂的。前折所说能战之舰就是这8艘。现代海军的强弱，只论船只新旧，火炮大小和速度快慢，不以人数多寡论高低。自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海军就没再添一艘新舰，操练虽然较勤，而战舰太少。对这些，臣在奏定海军章程时以及在前两次校阅的奏折中已经奏明了。

至于沿海陆军，除胶州的台工刚刚开始外山东威海有绥巩军8个营，护军2个营；在奉天大连有铭军10个营，旅顺口有四川提督宋庆的毅军8个营和亲庆军6个营；在山东烟台有嵩武军4个营；在直隶北塘口有仁字2个营，大沽口有炮队670名。臣过去所奉分布于直、东、奉三省把守海口炮台的2万人就是指这些人。此外驻守于天津、青县的盛军马步16个营，驻于军粮地的铭军马队2个营，驻芦营的武毅军2个营，都是添扎后路，以备策应的游击之师。

而绿营兵丁，早已疲弱。过去曾国藩和臣李鸿章创办的练军虽然有些用处，然而直隶地面辽阔，北面又与多伦围场为界，是盗贼出没的地方，常年扼要巡防，备多而力分，很难再抽调远征。至于北洋现有防务，各海口频年布署，形势周密，备将领久经战阵，尚属缓急可恃。就北洋海军而言，刚刚建立，现在铁、快各种舰只，辅以炮舰和鱼雷艇，再与海岸炮台相依辅，似乎尚可坚守渤海门户，

使敌不敢轻于窥视，即使不增一兵一卒，也断不致于有所疏虞。

臣鸿章前折中所请增饷征兵是体察倭韩情形，专指出境援剿而言。现在日本可备调用之兵有5万，中国必须与之相埒，至少也需有二三十营。如果移缓就急，调出一营，就需添募一营，以补其缺，才能免于空虚，为敌所乘。这次所请筹出二三百万两，实在是通盘筹划，防患于未然。事机已迫，但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从这道奏看，李鸿章前后所奏毫无欺隐，都是实情。而且皇帝及其近臣真是不了解情况。他们以为洋务轰轰烈烈地搞了这么多年，中国足可与人家一决雌雄了，殊不知李鸿章以前所说较有把握，只是说守住渤海门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听说外国无礼，就要与之较量，但一听说要增加军费，就不满。殊不知近代战争本来就是综合国力的消耗，谁不搞好军备，谁就要失败。中国的军备没有搞好，李鸿章心里最有数，无怪乎他避战求和。

五月二十九日(7月2日)，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日本兵1万人已经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塞，每天由水陆运来很多的武器，不但丝毫没有撤兵的意思，而且似乎还将有大军继续调来。日本蓄谋已久，欲望甚奢，如果英俄能以武力逼劝，日本也许听从，如果仅以调处着手，恐怕没有用处，反而误我军机。日人虽允许不先开战，但日本擅专朝鲜内政，中国当然难于坐视，这一来就成了衅自我开。日本以大兵来，自然不愿空回，极易寻衅。叶志超部扎于牙山，难于接济，应当载往鸭绿江边或平壤，否则两国失和即无归路。李鸿章接受他这个建议，六月初三日(7月5日)转告总署。

六月初七日(7月9日)，俄使喀希尼派参赞和领事来告诉李鸿章，俄国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不便使用武力强迫，至于韩国内政改革与否，俄国也不愿与闻。

李鸿章的幻想彻底破灭。虽然这是近日来估计到的结果，但还是恼羞成怒。他责问俄参赞巴福禄，上次也是你来告诉的，说是

俄国勒令日本撤兵，如不听，尚有第二层办法，忽然说不再管了，是前后语意不符。

巴说我等也觉得不符，恐怕是俄廷另听了旁人的话，喀使还说今后中日会谈，他也不再干预了。

李鸿章气得没法，气的是喀使误人不浅，白白地耽误了军事部署的时间。从这天起，他决心用兵了，但是又苦于陆军没有前敌统帅，海军诸将又无大才。

李鸿章原来对喀希尼寄托希望，信任喀希尼并没有错。喀使确实让俄国向日本发去措辞强硬的照会。而日本运用了外交策略，利用英美与俄国的矛盾，将日本政府的意见和俄国照会一一通知英、美政府。于是英美当局的驻俄使节分别向俄国外交部声明，没有帮助中国强迫日本撤兵的意思，致使俄国政府产生顾虑，也不敢对日采取强硬态度。

六月初七日(7月9日)，日本驻华代办小村寿太郎访晤总理衙门庆亲王，谈朝鲜事。小村主张先谈改革朝鲜内政再谈撤兵；庆亲王主张先谈撤兵再商改革细节。双方谈不拢，小村遂告别。这正是日本希望的结果，由此准备发最后通牒。而庆王错误以为可以由此“转圜”。所以英使欧格纳再来总署调停时，庆王还是老话重提。

这时，如果能果断地单方面撤兵，日本在外交上就处于困难地位，国际舆论会谴责它赖在朝鲜。中国也会摆脱战争危险。李鸿章也曾想到这里。六月初二日(7月4日)，李鸿章给袁世凯的电报说：“西人又劝叶军先撤，则日军久留更无理，公论更有劲，望速与叶妥商定义，电示酌办。”第二天，李鸿章电总署说，已电商叶志超和袁世凯将我军设法移至平壤或暂时调回。初十日(7月12日)，再次表示他同意将在朝军队撤回。

但是，光绪帝和主战派大臣们都不愿退兵，认为退兵有损天朝

体面。六月十二日(7月14日),李鸿章向叶志超转达圣谕:“我军撤回一节,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

同日(7月14日),小村受命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通告日本外务大臣来说,鉴于清国政府拒绝与日本一起改革朝鲜内政,今后因此如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这就是所谓第二次绝交书。

总署感到事态严重,马上电告李鸿章,日方“词意甚为决绝,似无转圜之机”;同日,以军机处密谕李鸿章速筹战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沿海各口要加强布置。于是李鸿章立派卫汝贵率盛军马步6000余人进平壤、宋庆所部提督马玉昆率毅军2000进义州、雇招商局轮船分批由海路运送至大东沟登岸,节节进发;此外电商由盛京派左宝贵统马步8个营进平壤,会合各军援助朝鲜汉城。

六月十四日(7月16日),总署向李鸿章转送主战上谕,指示强硬:

奉旨:现在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鲜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若再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延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钦此。

上谕之所以如此严厉,是因为连日朝内攻击李鸿章的奏折很多。文廷式奏折说,李鸿章不迅速调兵,是因为他立功之始就靠着洋人,“故终身以洋人为可恃,而于中国治法本源,军谋旧法,皆不甚留意。”礼部侍郎志锐批评他“一味因循”,借口于衅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

优秀的军事家绝不打无准备之仗。李鸿章深知中国没有准备好。他不想打这场战争,力图和平解决,避开战争。但是皇帝和主

战派的太臣们不允许。这正好让日本拖住在朝清兵的诡计得逞。使清军失去了战略退却的时机。

在朝鲜的袁世凯看到形势不好,于六月十四日(7月16日),以“病”和“死”等危言请李鸿章将他调回国来。六月十六日(7月18日),朝旨批准。十七日(19日),袁世凯离开韩国回华,经手事务交给唐绍仪代办。

六月初十日(7月12日)日本外相陆奥训令驻朝公使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十五日(17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对中国开战。十八日(20日),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圭介照会韩王,应请清国军队退出朝鲜,限三日内答复。韩王答复说此事“将来请中国政府核办”。大鸟不满。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日本扔掉尊重朝鲜“自主之国”的伪装,派兵围攻朝鲜王宫,把韩王掠去,拥立大院君主政,同时,派兵攻掠中国驻韩总理公署,扯下中国国旗,总理代办唐绍仪避入英国总领事馆。韩王在这种情况下派闵尚镐化装乘轮船到天津报告李鸿章,述说500年来中国所御赐的印物等完全被日兵掠去,兵库里数十年所藏的洋枪炮等武器也被夺去,内政完全由日人操纵,韩王无法过问。

李鸿章接到朝廷“一意主战”的上谕后,仍未积极布置军事“行动。六月十六日(7月18日),他电总署说,所谓二十日(22日)开仗之说“似是谣传”。他以洋务专家自居,坚守国际法。十八日(20日),电令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屈。切记勿忘!”

日本攻占了朝鲜王宫后,李鸿章才真的准备打仗。他匆忙增兵牙山,并力争控制制海权。

控制制海权的工作早就开始了。五月二十日(6月23日)他报告说,已派镇远铁甲舰、广丙、超勇2快船到仁川,官兵约600

人。后来镇远管带林泰曾探听到敌情，日本将以压倒中国在朝境舰船的绝对优势构衅。他请求将中国军舰撤回威海卫，以便集中北洋海军全军之力与日本海军战斗。李鸿章不肯。二十二日(25日)，李鸿章电示丁汝昌：应令静守，相机进止，岂可遽调回威海示弱！”二十六日(29日)，电告丁汝昌，据闻日本拟派鱼雷艇袭我军舰，速派快船往探，或者派大号鱼雷艇前往巡护。次日晨，李鸿章接丁汝昌电报，述林泰曾意见，如镇、济泊于牙山口，万一失和，必被所困，仍请将3船调回。李复电仍须派一船往牙察商，如虑该处煤粮难于接济，可以调回，但牙山应当留船接济，前后兼顾。当晚，李鸿章再电丁汝昌，指示派康济号赴韩，先往牙山察看，如果可以稳扎，即将平远、操江一并扎于牙山口，或者抽回一船，留三只船与陆军保持联络。

到了六月初二日(7月4日)，李鸿章对丁汝昌放松制海权的表现进行批评。电文说：诸船派到牙山两句，竟不敢分出1船去大同江口；汝拟于初十日(12日)以内带8艘舰巡视汉江和大同江一带，五六天就想回来，时间太短，这不过是摆摆样子；须知“大同江是我将来进兵要口，既往巡即须在彼妥酌布置，备护陆军，同去同回有何益处？”再次强调要从旅顺调来雷艇赴援朝鲜。

十三日(7月15日)，李鸿章电告丁汝昌，叶志超部“现居绝地，可危”，拟于十六日(18日)派5艘商轮往牙山将叶军全部接到大同江，然后移驻平壤，令丁汝昌派5艘军舰护卫并留守大同江口。但以商轮接运的计划没有实现。十九日(21日)，他向牙山添兵，派3艘军舰在牙山口外巡护。考虑到日本可能会袭击运兵船，特地租用了英国的商船。他根据国际法分析，日本不敢向英船开炮。

出乎意料，日本得到了中国增兵牙山的情报。日本联合舰队在牙山口外搜寻北洋护航舰只。英国商轮爱仁号和飞鲸号顺利完

成运兵任务后返航。二十三日(7月25日)济远和广乙号护送另一批运兵船来到丰岛海面时,被日舰发现。早七时四十五分,日本联合舰队向济远舰突然发炮,打响了甲午战争第一炮。形势敌强我弱,济远与广乙舰被敌舰包围,各自为战。广乙受重创而丧失,济远在进行激烈应战,并给敌舰以相当创伤之后,多处负伤,逃离战场。高升号运兵船遂被日舰击沉,船上1116名清军除245人遇救外,其余壮烈牺牲。还有在舰上服务的5名英国人,1名菲律宾舵工,和56名中外船员也一同殉难。接着,操江号运送军械来到海战区域,因不知故情,被日舰堵截迫降,船内有20万饷银,20门大炮,3000支步枪和大量弹药也被日截获,舰上83人被日军虏至佐世保港。

日军在偷袭清军运兵船的同时,另派陆军偷袭牙山陆军,在成欢驿小胜聂士成部。聂部苦战两日撤退。

战争打响了。事实证明国际法没有给李鸿章任何保护,只给他教训。他的指导思想开始由“避战求和”变为“以战求和”了。二十六日(7月28日),李鸿章电告总署,日先开战,应布告各国,使之咸知战端非自我开;驻日公使江凤藻应令撤回,日本驻我公使及各口领事皆应令其自去。

聂士成部自成欢驿撤退后,到公州与叶志超会合。然后北退,经近一个月退到平壤。叶志超饰败为胜。声称在成欢和公州一带以及沿途杀死日军数千人。这时,从汉城到平壤的电报线被日军截断,信息不灵。李鸿章被叶欺蒙,信以为真,据以上报总署。此时,军机处也连接清军获胜的消息。光绪皇帝和朝内大臣也都大为兴奋,以为战胜日本,左券在握。所以尽管是丰岛海战失败了,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光绪皇帝的寿辰却照常庆贺、赐宴并演戏于宁寿宫。七月初二日(8月2日),李鸿章给翰林院一位叫檀玘的写信,意气风发地写道: